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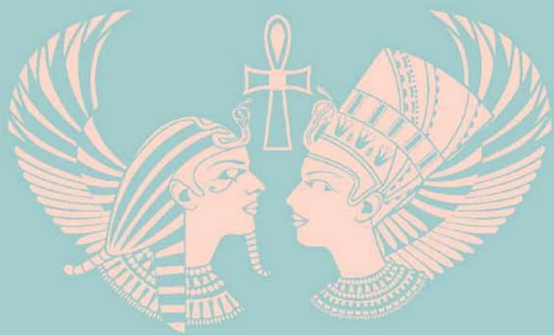
中国文学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研究系列丛书

文学人类学新论

——学科交叉的两大转向

唐启翠 叶舒宪 编著

着眼于跨学科大潮流，
梳理出两大学科转向的态势



復旦大學出版社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

“中国文学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研究”（10&ZD100）结项成果之二

文学人类学新论

——学科交叉的两大转向

唐启翠 叶舒宪 编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序 言

文学人类学是在20世纪后期的跨学科研究大潮中涌现出的一门新兴交叉学科。孕育其生长的学术潮流可概括为两个学科领域的研究转向：一是文化人类学研究的文学转向，又称人文转向；二是文学研究的人类学转向，又称文化转向。自文学人类学诞生之日起，对后一个转向的探讨就成为研究者入门的“过关考验”，相关的探讨和争鸣一直不断。^①而对前一个转向，属于文化人类学学科史的范畴，目前国内关注者很少。即便是在文化人类学的学科内部，对此方面的探讨也显得凤毛麟角。造成这种不平衡局面的原因，主要是从业者的知识结构方面的缺陷。如国内的师资方面，文化人类学科班人员较少，属于小众的学科。而文学人类学的研究队伍，基本上以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中国语言文学专业人士为主。语言文学专业的限制，使得他们较少考虑另外的一门新学科即文化人类学的学科史情况。这是本书从开篇就致力于陈述人类学的文学转向的初衷。只有充分从两大专业方面理解了转向所具有的学术史意义，才能为文学人类学这门新兴的交叉学科找到立足的理论基础。

20世纪德语世界中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兼神学家潘能伯格（Wolfhart Pannenberg）在其《人是什么——从神学看人类学》中开篇就说：“我们生

① 参看[美]乔纳森·卡勒：《文学理论》第三章“文学与文化研究”、第八章“属性、认同和主体”，李平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45—57、113—125页；[美]理查德·比尔纳其等：《超越文化转向》，方杰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美]詹姆逊：《文化转向》，胡亚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萧俊明：《文化转向的由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关于文化转向在亚洲研究中的表现，可参看余英时的文章：“Clio's New Cultural Turn and the Rediscovery of Tradition in Asia”，A Keynote Address to the 12th Conferenc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Historians of Asia,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91, pp.10-30。

活在一个人类学时代。一门关于人的广泛的科学是当代思想追求的主要目标。一大批科学研究部门为此联合起来。”^①既然生活在一个人类学时代，那么人类学所要追求的问题“人是什么”，就同时成为所有人文学科的共同问题。作为人学的文学，当然不会例外。“但事实上，人是什么这个问题，今天再也不能从世界出发得到回答，而是回到人自身。因此，关于人的科学获得了史无前例的重要性。”^②面对诸如政治人类学、法律人类学、艺术人类学、历史人类学、宗教人类学、医学人类学、教育人类学之类的新兴交叉学科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现状，我们不得不承认，文化人类学这一门学科获得了超越其他学科的重要性。这门只有在20世纪才获得长足发展的新学科，本身就是史无前例的，也是最能引领其他学科发展方向的。

和上述这些与文化人类学相结合的人文学科相比，文学人类学作为一种有组织的、持续发展的学术潮流，似乎仅仅在中国大陆获得一定的学科合法性身份。在中国以外的地方，文学人类学似乎不如历史人类学和艺术人类学那样兴旺发达，只是散见于个别的、零星的研究著述之中，没有相应的学术机构或学术组织，也没有在高等教育的专业科目中有所体现。进入新时期以来，文学人类学不仅在我国高校的研究生招生方向上得到官方认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重点教材中，《文学人类学教程》这种属于新潮和小众的专业教科书也赫然在列。2012年教育部还举办了“全国高校文学人类学骨干教师讲习班”（永川：重庆文理学院），一门跨学科的新知识通过师资培训的方式，开始向全国的相关专业进行推广。基于这种“风景这边独好”的新学科状态，开创并逐步完善新学科理论的任务也就责无旁贷地落在这一批走出单一学科界限的尝试者和先行者肩上。“中国文学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研究”项目能够在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首次从对策研究转向基础理论研究之际获准立项，突出显示出中国学者在尝试自己建构本土化的新理论形态。

为什么传统的文学研究在近半个世纪以来明显走向文化研究呢？马克·史密斯认为文化人类学的核心概念“文化”能够溢出本学科，成为再造

① [德]潘能伯格：《人是什么——从神学看当代人类学》，李秋零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第1页。

② 同上书，第2—3页。

整个人文社会科学工具，主要在于当代人对文化的思考确实提供了以往的学科视野所没有的东西——“一个打破学科思维模式、熔铸一个后学科取向的新机会”。^①早在2003年问世的《文学与人类学——知识全球化时代的文学研究》一书中，笔者就试图对20世纪后期日益明显的重要学术趋势——从学科界限分明的文学研究发展为打破学科的文化研究，作出学理性阐释，从知识全球化这个背景上说明文化研究是适应知识重新整合的时代需求的必然现象。这对于解决长期困扰学界的争议，以及回应各种“文学危机论”和“比较文学学科危机论”，提供了直接的理论回应。^②随后几年，在编撰第一部文学人类学专业研究生教材的过程中，又对20世纪以来的人文社会科学的人类学转向问题，作出学术系谱学的描述，撰写成近五万字的专章。^③遗憾的是，对人类学学科的人类学转向问题，并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

有鉴于此，本书的主要目标是，从学术史的脉络上梳理清楚两大学术转向及其相互关联，重点论述人类学的文学转向及其方法论意义，尤其注重将文化视为一种符号文本的阐释人类学范式，能给文学与文化的关联问题带来怎样的启示。通过回顾中国文学人类学产生的条件和新世纪以来的研究拓展情况，总结其理论建构的方向和基本内容——围绕文化文本、大小传统再划分、文化的符号编码程序、神话历史、四重证据法等学术关键命题，展开论述和讨论。在继往开来的意义上，对文学人类学今后的研究方向和学术前景作出某种规划预期和展望。

就文学人类学理论建构的意向而言，中国的人文学界在西学东渐以来的知识背景下，其理论建树方面一直处于非常尴尬的境地。一般而言，介绍和接受西方理论居多，本土一方的原创性理论建构却显得寥寥。除了教科书类型的高头讲章式“准理论”以外，确实拿不出什么像模像样的成理论体系的东西。这种局面极大挫伤着从业者的理论雄心。既然理论思维不是我们的强项，又何必以己之短去竞争他人之长呢？而没有先进理论的聚焦和引领作用，我们的文学和文化研究又怎么能跟上这个时代的变迁，拿出有

① [英] 马克·史密斯：《文化——再造社会科学》，张美川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页。

② 叶舒宪：《文学与人类学——知识全球化时代的文学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③ 叶舒宪：《文学人类学教程》第二章“20世纪文学学科的人类学转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39—83页。

厚重底蕴和学术分量的研究成果呢？后殖民主义理论家阿吉兹·阿罕默德认为：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里，一项几乎涵盖所有英语国家文学研究领域的显著发展成果，便是理论生产的高度繁荣。“理论的爆炸作为一种对话和重构，其主要方面已经成为一种融入了欧陆思想成果的杂糅：本雅明、法兰克福学派、语言学、阐释学、现象学、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沃罗西洛夫/巴赫金学派、葛兰西、弗洛伊德，以及拉康式的弗洛伊德，等等。”^①当代的理论生产所围绕的新关键词已经今非昔比，不再是什么审美、文学性、修辞术、风格、趣味，而是“反经典”“文化民族主义”“文化认同”“少数族裔话语”“多元文化主义”“跨文化认知”“离散”等一系列来自文化人类学的术语。在这种后现代、后结构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现实语境中，没有相关的人类学的基础知识，是无法理解和应对当代的理论生产新浪潮的。用乔纳森·卡勒的说法，我们必须面对1960年以来发生的事实：

从事文学研究的人已经开始研究文学研究领域以外的著作，因为那些著作在语言、思想、历史或文化各方面所作的分析都为文本和文化问题提供了更新、更有说服力的解释。这种意义上的理论已经不是一套为文学研究而设的方法，而是一系列没有界限的、评说天下万物的各种著作……“理论”的种类包括人类学、艺术史、电影研究、性研究、语言学、哲学、政治理论、心理分析、科学研究、社会和思想史，以及社会学等各方面的著作。^②

卡勒还认为：“成为‘理论’的著作为别人在解释意义、本质、文化、精神的作用、公众经验与个人经验的关系，以及大的历史力量与个人经验的关系时提供借鉴。”^③本书也希望在这一意义上陈述文学人类学的理论，即能够实际地为他人的研究提供解释问题的借鉴，而不希望做成一套高头讲章式的空疏无用的“准理论”。

① [印度]阿吉兹·阿罕默德：《在理论内部》，易晖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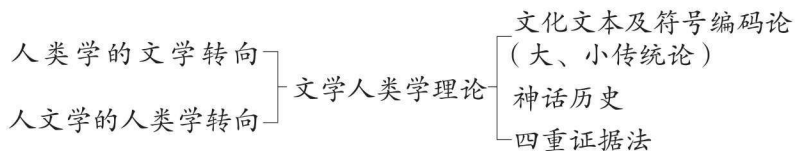
② [美]乔纳森·卡勒：《文学理论》，李平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4页。

③ 同上。

中国文学人类学的理论关注集中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一是关于文化文本的符号编码论——大传统的非文字符号解读，和小传统的文字文本解读的相关性、因果关系、神话历史等。希望通过这样的文化符号的历史分析视角，厘清口传文学与书面文学、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的母子关系，同时厘清文化文本与文学文本的母子关系。二是关于方法论的，即四重证据法。在这方面，本重大项目的一个子课题就是《四重证据法研究》，所以本书在理论分工的意义上，侧重承接已经先行出版的《文化符号学——大小传统新视野》一书的理论研究思路，集中关注前一方面的梳理和建构。至于与“神话历史”主题相关的著述，则收录在南方日报出版社的“神话历史丛书”中。

以下试用一个结构图来表示本书的内容与文学人类学理论及方法的总体关联：



叶舒宪

目 录

上编 人类学的文学转向

第一章 人类学的文学转向：从伯克到格尔兹003
一、超越科学主义：格尔兹和人类学的转向003
二、思想源泉：从维特根斯坦到伯克007
三、伯克对文化阐释理论的启示009
四、跨学科引领创新：伯克与格尔兹的共同经验016
第二章 当代英美人类学的文学转向019
一、范式转移：科学民族志的危机020
二、承前启后：《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的话题延续023
三、当代实验民族志文类026
四、女性写文化036
五、世界体系与多点民族志040
六、数字化时代的民族志043
第三章 文化批评与人类学的文学转向050
一、表述危机与人类学写作的实验时代050
二、写作：文学转向的契机054
三、焦点问题：真实与虚构058

第四章 表述与建构：民族志写作的文学性062
一、文学转向与民族志的文学性062
二、虚构的图像：英国早期人类学写作064
三、文化阐释：美国民族志的探索070
四、主观描述：法国民族志写作074
五、作为文学的人类学076
第五章 主体性与人类学写作的温度081
一、动情/不动情：人类学写作的四场争论082
二、我/非我：写作中的人类学家086
三、冰点/沸点：人类学写作的温度093
第六章 诗性与民族志成为作品的可能097
一、诗性智慧：民族志知识范式的转向099
二、诗性自我：民族志研究的共通经验104
三、诗性逻辑：民族志研究的文化手段112
四、诗性写作：民族志传记118
第七章 文学之翼：人类学文学转向的思考125
一、人类学的文学转向125
二、书写或表述：人类学内在的文学性133
三、养料与助手：人类学史中的文学137
四、科学与文学：人类学与生俱来的两翼140

中编 文学的人类学转向

第八章 当代中国文学思想的人类学转向145
一、文学创作的人类学转向145

二、文学人类学在中国146
三、四重证据法与文学人类学的前景153
第九章 当代中国文学研究的人类学转向156
一、文学人类学与中国古典文学的重释157
二、文化诗学：回归文学的文化维度160
三、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人类学转向163
第十章 文史“故事”中的人类学170
一、“文学”反思：文化大传统视野170
二、西王母“故事”的人类学性176
三、文学文本：人类学的另一种田野185
第十一章 当代日本文学的人类学转向187
一、再现《金枝》：《1Q84》和《水死》187
二、《金枝》密码及其文学影响192
三、杀王：古老主题的现代呈现197
下编 交叉与创新	
第十二章 开放与超越：文学人类学的超学科性205
一、思维之镜：认知共性与表述多样性206
二、原型之制：从文本到文化209
三、方法之技：从国学考据到四重证据213
第十三章 整合与拓展：探求文学人类学的新发展217
一、从跨学科研究到新兴交叉学科218
二、问题与方法：再文学化与人类学化220

三、发展趋势：立足本土与国际对话223
第十四章 反思与推进：中国文学人类学的理论建构227
一、范式转向：从中国神话到神话中国228
二、四重证据：文化文本的立体建构与阐释234
三、神话历史：历史记忆的原始传统回归243
四、大小传统：人生识字糊涂始的突破与觉悟254
五、玉教：华夏文明核心价值观传播的驱动力265
六、N级编码：中国文化的编码与解码自觉278
七、玉教新教革命：从物质与精神上再统一中国287
第十五章 图像、器物与文化文本296
一、从文学文本到文化文本296
二、物与图像：重新讲述“世界故事”298
三、从文化符号学看“物的叙事”312
附录 《文学与人类学之间：跨学科话语》述评316
参考文献333
编写说明351

上 编

人类学的文学转向



| 第一章 |

人类学的文学转向：从伯克到格尔兹

内容摘要

19世纪后期诞生的人类学在20世纪中后期发生研究范式的革命性转向，从“人的科学”转变为文化阐释学。追溯阐释人类学派对这场转向的驱动之功，离不开其代表人物格尔兹所受到的文学和修辞学研究方法的影响。本章分析美国的文学批评家肯尼思·伯克给格尔兹创立文化阐释学带来的重要学术启示，从戏剧主义、视角主义、隐喻与文化文本的建构这三个方面，剖析人类学的文学转向（或“人文转向”）的理论根基，从而揭示文学批评给人类学方法大变革带来的思想启迪。

一、超越科学主义：格尔兹和人类学的转向

克利福德·格尔兹（Clifford Geertz, 1926—2006）是美国人类学家，以开创阐释人类学学派而著称。20世纪后期以来，该派的学术影响力与日俱增，在文化人类学之外也产生相当广泛的反响。格尔兹已经成为人文社会科学方面被引用率最高的当代学者之一，其国际学界引用最多的一部书是其论文集《文化的解释》。格尔兹在该书中提出，人类学以认知文化为己任，需要努力建构一种探索意义的阐释性学科，而非寻找逻辑公式的实证科学。他发展了赖尔的“深描”理论和帕森斯的社会行动结构理论，认为民族志是

阐释性的，它所阐释的对象是社会话语流，这种阐释在于努力从一去不复返的场合中抢救这种话语的“言说”，把它固定在阅读形式中。^①民族志可以而且应当追求类似于文学写作中的细节真实。这一系列理论创见，引导着人类学这门学科在20世纪后期发生根本的转向。

1983年春，57岁的格尔兹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做了四场纪念讲座，主题为人类学者的文本写作。分别讨论列维-斯特劳斯、埃文思-普里查德（E. E. Evans-Prichard）和马林诺夫斯基等人的民族志写作问题。1987年，这些讲座稿经过增订后，结集为一部书，书名为《论著与生活：作为作者的人类学家》。这个书名把人类学家的民族志书写和文学创作之间的异同问题凸显出来。人类学在19世纪后期产生的初衷是要效法自然科学的范式，建立一门“人的科学”（The Science of Man）。格尔兹不再将人类学家视为科学家，而是视为作家（author），这样的视角转换意味着人类学这门新学科的研究范式及理论方法的大转向。笔者称为“人类学的文学转向”或“人文转向”。

在《文化的解释》中，格尔兹特意强调人类学写作具有多层阐释的意义，包括本土人才能作出的第一层次的阐释。“由此看来，人类学著述是小说；说它们是小说，意思是说它们是‘虚构的事情’、‘制造出来的东西’——即‘小说’的原义——并非说它们是假的、不真实的或仅仅是个‘想象’的思想实验。”^②就此而言，民族志的真实不可能是照相式的真实，其真实程度只可能是介乎小说的真实和报告文学的真实之间。这样的类比自然引发出人类学家的写作与文学写作的因缘。

《文化的解释》书中还提道：“如果你要根据亲眼目睹的爪哇小佃农冒着热带暴雨翻地或摩洛哥裁缝在20瓦的灯泡下为土耳其式长袍刺绣的情景，连篇累牍地报道群众所受到的剥削，这还是有价值的。如果因此说它让你知道了一切（使你处于某种道德上优势，并由此蔑视那些道德上处于劣势的

① [美]克利福德·格尔兹（Clifford Geertz）：《文化的解释》，纳日碧力戈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2—23页。（Clifford Geertz的著作译介入中国时，不同译者对其姓名的汉译有小异，或格尔茨，或格尔兹，或吉尔兹，本书统一用格尔兹。）

② 同上书，第17—18页。

人),那就只可能是长期离群索居的看法。”^①这一引文与1987年版《红楼梦》电视剧的两个相衔接的镜头十分相似:第一个是晴雯带病深夜给宝玉补孔雀服,第二个是贾府的佃户深夜冒雪给贾府交租。一个远在美国的当代人类学家在摩洛哥所做的田野调查会与中国古代四大名著之一《红楼梦》改编的电视剧有如此近乎一致的情景,还是很能让人引起深思的。作进一步的对比发现,引文强调的是民族志者从所见的场景中可得到的信息是有限的,民族志者不能轻易下道德判断,否则会陷入孤陋寡闻的危险;而电视剧作品有意将这两个镜头并置,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劳动人民所受到的剥削。不过联系上下文来看,晴雯补衣,是晴雯倔强要强的性格以及对宝玉的一片深情所致,并非一个孤立的事件或标志,《红楼梦》不是反映阶级剥削和压迫的作品。同理,当人类学家面对具体而微的异文化场景或文化现象时,孤立地截取片段同样有以偏概全之嫌。因此,理解文化现象,有时像要解读一部作品:“分析工作就是理清意义的结构……它本应更像文学批评——并确定这些意义结构的社会基础和含义。……民族志是深描……民族志者事实上所面临的是大量复杂的概念结构,其中许多相互迭压,纠缠在一起,它们既奇怪、不规则、又不明确……从事民族志就像解读一份手稿——陌生、字迹模糊、充满省略、前后不一致、可疑的更改和带偏见的评语,但它并非用习惯上的表音字符写成,而是用行为模式的例子临时写成的。”^②人类学和文学在此种意义上的重合为人类学的转向提供了一个崭新的方向。文本细读的方法、对象征与意义的追求让人类学学科超越了科学主义。

格尔兹认为,了解一门科学,首先要看的不是它的理论和发现,而是它的实践者做什么。人类学的实践者做的正是民族志。民族志的发展史上有三个时代:第一个时代主导精神比较自由,内容大多是浮光掠影的印象式记录;第二个时代主导精神标榜民族志的科学性,要求以专业的素养深入社会进行参与观察,讲求民族志文本的科学性;第三个时代主导精神是对民族志写作科学性的反思,民族志者更倾向于坦白自己写作的背景并充满自我反

① [美]克利福德·格尔兹:《文化的解释》,纳日碧力戈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5页。

② 同上书,第10—11页。

思，具有后现代特色。^① 格尔兹的文化阐释既具有科学性的一面，又具有反思和超越科学性的一面，介乎后两个时代之间。

在他之前，民族志的写作以马林诺夫斯基作为“科学民族志”的典范。而在格尔兹写作《文化的解释》各篇的20世纪60年代，恰逢列维-斯特劳斯拉斯继富有浪漫主义特色的人类学笔记《忧郁的热带》之后，进入《野性的思维》——文化结构主义建构的时期。不论是引向功能主义还是结构主义，虽然这两位代表人物的人类学笔记中都有类似文学随笔一样的文本（这在格尔兹看来是非常有意义的），但他们努力的方向却是一种实证主义、科学主义的探索方式。格尔兹对此深表怀疑。就《野性的思维》来看，列维-斯特劳斯拉斯用结构主义的方法研究原始人类的思维，将原始思维视为充满智慧、理性和逻辑的；现代科学思维不过是原始思维链条上的一环。格尔兹认为，这本享誉极高的思维研究著作，其中描述的高等科学不过是《忧郁的热带》中英雄探险的“十分简单的转换”，这与卢梭《社会起源论》之于《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一样，寻求的是“人类社会不可动摇的基础”，而这个基础根本不是社会意义上的，而是心理上的——一种理性的、普遍的、永恒的因而也是道德的思维。格尔兹用“古典信念的现代化表白”以及“是蜕变科学还是炼金术”的怀疑来反思结构主义以看似科学的方式传达出的依旧富有古典色彩的形象。^②

对于文化研究，格尔兹不主张套用模式、结构等理论性的框架。同样，在20世纪60年代主导美国社会科学领域的帕森斯的结构功能论，在格尔兹看来也过于高蹈和理念化，他认为帕森斯并不是太有文化意味，“而是根本就和文化不搭边”。^③ 文化并不是整合价值体系中的行为范式，文化是流动的，并能对行为本身有潜在制约作用；倒退回抽象的理论不是研究文化的有效方法。文化的解释是符号性的，因而追求的不是探索规律，而是寻求对特

① [美] 詹姆斯·克利福德、乔治·E. 马库斯编：《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高丙中等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15页。

② [美] 克利福德·格尔兹：《文化的解释》，纳日碧力戈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10—415页。

③ Jeffrey C. Alexander, ed., *Interpreting Clifford Geertz: Cultural Investigation in the Social Science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1, p.2.